评论员观察

制止年底“突击花钱”不能只靠自觉

政府部门哪来这么多闲钱?又为何如此大手大脚?如果这些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,公众只是恳请官员出于道德自觉,把钱花在刀刃上,很难得到预想的结果。

□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

临近年末,又是一关。按理说,各级政府应该在工作上查遗补缺,有不足的就该着力弥补一下,但是,也有部门把“花钱”当成了突击任务。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,各级政府财政部门不得不在年底这两个月中确定超过3.5万亿元财政资金的去向,一言以蔽之就是突击花钱。这种现象往年也有,只是今年可能更为严重。

一旦把花钱当成任务,必然是花钱如流水,有败家行为也不足为奇。据报道,在2010年底的一场招标采购中,湖南省财政厅、文化厅、省直机关政府采购中心花了3000万元,买下了市价1500万元的东西。而相关官员对此答复,这是“预算执行的需要”,“如今不仅有预算编制,还有预算执行。如果预算没有执行完,财政就要收回,必然会影响第二年的预算编制。”为花钱而花钱,这算得上是现代版的“买椟还珠”,而背后一些官员早把“小算盘”打得劈啪乱响。在他们看来,凡是申请下来的预算资金都是自己掌握的,如果不尽快地花掉,交回去才是真正的浪费,而且还会影响到来年的预算。崽卖爷田心不疼。商人报价7000元的音箱,被政府部门限定了1.9万元的最低价,虽有违市场规律,却遵守了“突击花预算”的潜规则。

财政支出实际上就是在替纳税人花钱,如有挥霍,即便经手官员不以为意,纳税人也会心疼不已。对于政府部门突击花钱的行为,有人感慨何不去买校车。其实,年底剩余的这些预算资金是买了音箱还是买了校车,又或者去做了公益事业,都不是问题的症结。政府部门哪来这么多闲钱?又为何如此大手大脚?如果这些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,公众只是恳请官员出于道德自觉,把钱花在刀刃上,很难得到预想的结果。

政府部门闲钱多,应该能证明财政预算不够科学、不够合理、不够精确。一些政府部门不是根据实际需要申请预算编制,而是能多要就不少要,为部门利益争取最大空间。而粗疏的预算编制,也给这些部门留下了足够多的空子。所以,粗疏的预算即便公开了,纳税人还是看不懂,更谈不上监督。今年,中央政府部门公布“三公”经费,面对空泛的数字,公众也是无法判断哪些是必需的、哪些是不合理的。而政府部门的大手大脚,也可以证明预算资金被批准之后,在执行过程中没有得到有效的监控。如果上级财政部门往往只负责汇总上报,并不仔细审核花销的合理性和合法性,那么下级部门自然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,只要能对上账就行了。

乱花钱名目繁多,杜绝乱花钱的方法却很简单,那就是透明。四川巴中白庙乡从去年开始“裸晒”账本就是一个不错的尝试。花纳税人的钱就该让纳税人监督,这种监督不能仅仅是年初看预算、年终看决算,还要能时时查账。在这种透明的环境中,哪个部门还敢明目张胆地“只买贵的不买对的”?

体育进高考,不是“体育为高考”

□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

2012年,山东省将把体育成绩计入高考成绩,引发了中学生的锻炼热潮。省城多所中学已经开始有目的地加强体育教育,原本不被重视的体育课,一时间成了“香饽饽”。然而,某高中最近的一次体质健康监测结果却令人尴尬——在全班近30个男生中,有16人连一个简单的引体向上动作都无法完成。

调查结果表明,“体育进高考”确实对学生锻炼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,但短时间内并不足以改变学生身体素质普遍下滑的现实。这种以单纯应试为目的、“临阵磨枪”式的体育锻炼,也不是改善学生体质的终南捷径。

我国国民体质监测数据表明,从1985年开始,我国中小学生身体素质呈现持续下滑趋势。直到2010年,多项抽检数据首次止跌,但大学生人群的身体素质仍旧延续下滑的趋势;中小学生营养过剩情况普遍,超重和肥胖比例城乡都在持续增加;在所有年龄层,近视的比例都在上升。与之相对应的是,2010年我国的GDP总量是1985年的40倍以上。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,人民生活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,但这些似乎并没有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健康。

生活变好了,学生体质却下降了,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。在升学的压力之下体育课被边缘化,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,但绝不代表全部。家长的溺爱,让孩子变得越来越娇气;学校出于安全考虑,往往放弃高强度的锻炼方法;而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,很容易让众多年轻人变得“宅”起来,失去了主动锻炼的热情。如此等等,都是造成学生体质下降的重要因素。

所以,“体育进高考”只是一个政策性的杠杆,目的是以此唤起学校和社会对于体育的重视,让学生更多地参与锻炼。但“体育进高考”,绝不意味着“体育为高考”,将学生的锻炼看作是应付高考的手段,本身便违背了体育的内涵。

生命在于运动。方法得当的体育锻炼,不仅可以增强体质,更可以雕塑一个人的心智与意志,给人带来身心上的双重愉悦感。如果学生的锻炼并非出于兴趣,而是疲于应对考试,那么在这种应景式的训练结束之后,甚至可能增加学生对体育运动的抵触感。如此一来,“体育进高考”的初衷不仅不能实现,反而给考生增加了一项新的负担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“体育进高考”的指向并不在考试本身,而是向社会彰显了一种评价人才的新理念,即重视身体和智慧的同步发展。一个人需秉持锻炼的习惯,以强健的身体、豁达的态度,去面对人生的每一次“高考”。

微说

新浪微博 weibo.com

@光远看经济:

该赞美就赞美,该批评就批评。赞美无自由,批评就很有价值和意义?我赞美我认为可以赞美的,批评我认为可以批评的,这是我的自由。

@秦海璐:

以前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叫“文艺工作者”,属能文能艺,所以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;后来改革开放流行画圈,我们就变成“演艺圈”了,和文没了什么关系成了演,虽说还有个艺在却也开始透露着一丝不真实了;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又被换了称谓变成“娱乐圈”了,没了文也用不着艺了,不受人待见也属正常了。

@徐小平:

我在想:乔布斯想拯救苹果,但苹果没有人理他,他该多痛苦。但他就继续做好他的产品,做好他的事情——苹果不找他,他可以自己做到成功;苹果找他,他万事俱备,马到成功。我们自己在生活中也会有这种时刻,但千万不要有怀才不遇的郁闷和抱怨,而要学习乔伯伯好榜样,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到极致。

@熊培云:

宾馆,门口的地上塞进一堆卡片,够凑成一副扑克了,上面提示“可开正式发票”。买个春都要报销,你让人家辜鸿铭怎么看你。

@解玺璋:

一位名叫杜里舒的,上世纪20年代来中国讲演,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凡物的文明,都是堆积的非进化的,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。”给物质崇拜者泼点冷水。

@石述思:

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%的专业,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。相对于应用学科,这个规定有道理,但对于基础学科,如哲学、文学、历史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都无异于雪上加霜。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工程师思维的表现,一个国家除了有日常干活的,还需要输送创新动力的,更需要引领价值方向的。

■本版投稿信箱:
zhangjinling@qlwb.com.cn

读者来信

“伪城市化”不是死结

编辑:

你好!

11月23日,看到报道——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谈征地纠纷,认为“征地造成大量伪城市化农民”。我很赞同甘藏春说的:农民反对的不是征地,而是权利没保障。

农民“城市化”,不是将居住地从“农村”到“城市”简单对换、转户口了事,更不是“只管征地,不管百姓情绪”的自作主张。只有在对等尊重的基础上,虑及百姓诉求,补偿和安置合理化,才能在磨合中,达成共识。无视农民权益,抑或把他们排斥在“市民待遇”之外,都是对农民利益的无理剥夺。

征地不等于要“消灭村庄”,或将农民从土地抽离出去,割裂村庄传统。在城市化过程中,不少地方积极拥抱“拆村并居”政策,采取村改社、宅基地换房、土地换社保等措施,顾全了农民的权益补偿,也获得城乡土地的级差效益。尊重农民呼声,在政策空间内大有可为。

看似纠结,征地矛盾却并非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死结。利益补偿和权利救济“欠债”已久,也许无关财政等的捉襟见肘,关乎对弱势权利的惯性忽略:粗暴的征地方式和吝啬的补偿,大有改善余地,不能老找“财力窘迫”的借口。 **读者:余宗明**

阶梯价格别搞成价格普涨

编辑:

你好!

齐鲁晚报11月23日报道《民用阶梯电(气)价有望实施》。如此一来,“一度电多少钱”的单一形式将被打破。阶梯价格的好处是有利于鼓励用户节约用电、用气,增强环保意识。所以,这个价格模式应该被当做调节用量的杠杆,而不该成为能源企业增收的途径。无论是否实行阶梯价格,民用消费者的负担不该有整体提高。既然耗能大户增加了开支,那么更多的小用户就该享受到更低的价格,这才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。

读者:武为

“停购公车买校车”需制度保障

编辑:

你好!

看了齐鲁晚报11月23日《淄博张店停购公车买校车》的报道,笔者不禁为之叫好。

据报道,去年政府采购汽车金额攀升至800亿元,占总采购规模的14%,平均年增超过100亿元。一边是公车消费居高不下,一边是对校车投入严重不足,两者形成鲜明对比,这也受到公众的广泛质疑。

当下,校车安全问题受到空前关注,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表态,将减少公车开支加大对校车的投入。是为了平息公众舆论也好,是政府责任意识的理性回归也罢,其行为本身还是值得肯定的。为学生提供安全的校车,让学生放心地去上学,是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。亡羊补牢犹未为晚,“停购公车买校车”,但愿更多的地方政府参与其中。但“停购公车买校车”,目前还仅是一些地方政府的自觉行动,更需要从制度上保障公共财政对校车的投入。

读者:董昭